

第七章 從《史記》人物形象的特出看司馬遷的創作意識

自古以來，倘若非政府指派委任的官修歷史，大凡私修歷史作者的個人寄託與用意多半是比較鮮明的。所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¹既然如此，我們看待司馬遷的《史記》，則無可避免地必須討論到作者創作時的個人意識、價值認定等問題。尤其人是多面而複雜的個體，遇到不同的事件刺激而產生不同的反應或思考，實是人情必然之事。而「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馬遷通過對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掌握，有意無意間均體現了個人「善善惡惡」的標準。是故我們藉由分析司馬遷對傳中人物的描寫手法，對史料揀擇取捨的態度，自然可以爬梳整理出作者的創作意識。李長之先生也謂：

從來的史書沒有像它（史記）這樣具有作者個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
生活經驗，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與心腸。
所以這不但是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書，而且是司馬遷自己的一部絕好傳
記。因此，我們必須能把握《史記》中司馬遷之主觀的用意，纔能理解這
部書，纔能欣賞這部書。²

因此，我們便根據《史記》對《左傳》、《國語》等史料的剪裁鑄鑄，對當中

¹ 《史記 太史公自序》，頁1352。

²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民國88年，頁247。

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或突出，歸結出幾項特點，以便進行以下的探討。

一、對含辱忍垢者的共鳴

在我們探討這個主題之前，歷來早已有許多學者專家對此有相當的論述與見解，而這當然是由於「司馬遷發憤著書」一說深獲認同而來。我們在此希能先對「發憤著書」的意涵做一澄清與了解，才能免於人云亦云之弊。

關於司馬遷「發憤著書」的說法，最早是劉知幾在《史通 雜說上》³中所提出。而司馬遷本人也曾有云：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⁴

³ 劉知幾：《史通 雜說上》：「《漢書》載子長 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其文原在批評司馬遷不應把《呂氏春秋》一書比附於等同自己發憤著書之類。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頁288。

⁴ 《文選 報任少卿書》，頁1044。

因為「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所以「述往事，思來者」、「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這些都指出了此「憤」的性質。有部分論者逕以此「憤」解讀為怨憤之「憤」，甚而言之鑿鑿地推論司馬遷作《史記》有「文化復仇」之意的觀點，⁵這些都是過於偏頗的解釋。我們認為劉熙載《藝概》當中所云，才是比較合理及貼近司馬遷內心情感的說法：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⁶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⁷

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史公為尚。⁸

而所謂的得「離騷之情」為何？屈原《九章·惜誦》中說道：「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⁹；司馬遷也謂屈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¹⁰。將鬱結於心，不得通其道的澎湃情緒，藉由著述的方式，宣洩表達出來，這才是「發憤著書」的

⁵ 如王立：從復仇文學主題看復仇動機的傳奇質素，《山西大學學報》，2000年第二十三卷第2期；盧敦基：史記中的傳奇心態略論，《浙江學刊》第六期，1993。二文均有述及。

⁶ 劉熙載：《藝概 卷一 文概》，臺北：華正書局，民國74年，頁12。

⁷ 《藝概 卷一 文概》，頁12。

⁸ 《藝概 卷一 文概》，頁12。

⁹ 屈原：《九章·惜誦》，引自《古詩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頁74。

¹⁰ 《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頁1004。

真意。李長之也說：

情感者，纔是司馬遷的本質。他的書是贊歎，是感慨，是苦悶，是情感的宣洩，總之，是抒情的而已！¹¹

有了這樣的認識，才不致於對《史記》當中大量稱揚的「含辱忍垢」主題斷然曲解為「文化復仇」的手段之一。

事實上，由於司馬遷的個人遭遇，讓他的確對於歷史上受盡屈辱後乃有所為的人物事蹟特別「與我心有戚戚焉」。為了《史記》草創未就，惜其不成，他能「已就極刑而無愠色」。所以當在為伍子胥立傳時，司馬遷不僅高度稱讚他：

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¹²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也曾注意到司馬遷對於伍子胥形象的描寫除了以《左傳》及《國語》的史料為基礎外，更大費筆墨地加入自己的見解與想像；讓原本性格面貌在《左傳》與《國語》當中俱無如此突出鮮明的伍子胥變成一個具有剛戾性格的烈丈夫，同時也特意強調他歷經萬難，終至成功雪恥的人物圖像，令後代讀者讀來莫不為之悲咽流涕；在在都顯示了司馬遷對於伍子胥其人的認同與偏

¹¹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1 0 3。

¹² 《史記 伍子胥列傳》，頁 8 7 5。

愛。倘非如此，伍子胥的形象又何以能在司馬遷筆下如此豐富飽滿？

再來看句踐的例子。句踐在困於會稽之時，曾喟然長嘆道：「吾終於此乎？」¹³然大夫文種勉勵他勿自怨自艾，雖此身暫遭蹇頓，未必非福。此段乃《史記》所獨有，未見於其他史料，則司馬遷強調句踐其人忍恥含垢，經過二十年生聚教訓終能一償前辱的意圖確實十分顯著；同時更刻畫句踐自失敗中成長的人生歷程，這也顯示了司馬遷對於句踐能隱忍苟活，為求雪恥的毅力十分崇敬。這些人物事蹟雖都有史料可徵，然司馬遷還是在前代史料的基礎上做了自己的詮釋與發揮，這當然是和他自身遭遇有莫大的關係。

除了就既有史料再做個人聯想發揮之外，其他在《史記》當中所出現的「忍辱求成」的人物事蹟而獲太史公青睞而入史者尚有甚多。如「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¹⁴；「然二子（范雎蔡澤）不困厄，惡能激乎？」¹⁵；藉魯仲連之口道出：「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若此二士者（管仲、曹沫），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¹⁶等例，都說明了太史公遭宮刑橫禍後，希望自己能「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以償前辱的心態。因此，特別對這些含辱忍垢者的形象多所著墨，正是《史記》人物形象當中特別突出的一項特徵。

二、對媚主求榮，蔽主視聽者的痛惡

¹³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1。

¹⁴ 《史記 平原君虞卿列傳》，頁955。

¹⁵ 《史記 范雎蔡澤列傳》，頁978。

¹⁶ 《史記 魯仲連鄒陽列傳》，頁997。

雖說「懲惡勸善」，「賢賢賤不肖」是史家應有的治史態度，但史學家仍應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保持客觀理性，勿做過度的價值評斷。杜維運氏對此也提出他的看法：

對人物運以道德判斷，永遠無法完全避免。除非我們忘去所學的一切，不然，不可能不尋求人生中的美好（goodness）與正義（justice）。一涉及人生中的美好與正義，就是所謂道德判斷了。¹⁷

史家在無法完全避免個人道德判斷的情況下，對於某些敗德之行或違反正義之舉有所撻伐是不難理解的。但我們卻發現太史公對於媚主求榮，蔽主視聽一類的讒慝小人往往有深惡痛絕之情流露於字裡行間，其態度之堅決讓讀者很難不去重視。以太史公當初對於李陵案仗義直言，挺身而出的表現來看，我們都會同意司馬遷追求正義公理的性格絕對強烈；是以他在下筆為史時有這樣鮮明的風格展現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們不妨舉伯嚭為例來做說明。吳國太宰伯嚭的形象在司馬遷手裡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罪人：他不僅陷害忠良，造成夫差對伍子胥的疏離與不信任；同時更因受賂而促成越國求和。司馬遷於《左傳》與《國語》的記述外，獨在《史記》當中拈出此點，做為太宰嚭重要的人物形象特點，此實不可謂無意之舉；另，《左傳》和《國語》均未言及句踐滅吳後誅殺太宰嚭，然而在《史記》當中歷歷言之：

¹⁷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傳記的特質與撰寫方法》，頁298。

「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¹⁸；「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¹⁹；
「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²⁰明白指出太宰嚭的「不忠」。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於佞幸小人之危害邦國社稷，有著強烈的譴責與深惡痛絕的情緒。

除此之外，在《史記》當中顯例仍有甚多。在 淮南衡山列傳 的論贊中，太史公曰：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²¹

太史公深責伍被慫恿煽惑淮南王謀反，導致淮南王劉安落得國除自剄的下場；蒙恬列傳 中蒙恬在吞藥自殺前怪罪自己乃因「城？萬餘里，其中不能無絕地脈」之故因而遭來殺身之禍；然太史公卻直指蒙恬阿意興功，不恤民力，以致終不能保全其身：

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疾，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

¹⁸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 9 2。

¹⁹ 《史記 吳太伯世家》，頁 5 8 1。

²⁰ 《史記 伍子胥列傳》，頁 8 7 5。

²¹ 《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頁 1 2 6 3。

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²²

在此太史公仍是強調身為名將的蒙恬應該扮演輔弼股肱的角色，而不該阿附上意，以遂逞其私欲，最後落了個身死名敗的下場；在《屈原賈生列傳》中，除了明白指出屈原因同列大夫上官靳尚欲與之爭寵而加以讒陷，屈原乃「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²³故做《離騷》；其後太史公又慷慨激昂，幾近忘情地一氣呵成，洋洋灑灑寫下：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做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辱。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²⁴

這段文字除了讚美屈原的志行高潔之外，難道不也是對其「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遭讒懷憂的遭遇寄與無限的惋惜與慨嘆？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屈原的同

²² 《史記 蒙恬列傳》，頁1041。

²³ 《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頁1004。

²⁴ 《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頁1004。

情是很深重的。

再來看看鄒陽的例子。鄒陽客游於梁，而遭羊勝、公孫詭等人讒於梁孝王而被捕下獄。鄒陽於獄中上書，其中有言曰：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²⁵

太史公於此所繫的用意可謂明矣：「女無醜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²⁶，正是司馬遷內心感慨的寫照。

公孫弘又是另一個顯例，他從政非但「不肯面折庭爭」，還「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²⁷，結果不僅深獲武帝重用賞識，最後還得以在宰相任內壽終。在《平津侯主父列傳》的描述裡，司馬遷透過饒富貶抑，甚至略帶輕蔑的筆法，刻畫出一個專以阿主媚上，求自保全身的大臣形象。同樣地，司馬遷也透過汲黯道出張湯的為人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²⁸，則一付巧言令色的小人嘴臉形象如躍紙上。對於這些專以吹捧為能事之徒，司馬遷是深深切齒的。我們細讀《報任少卿書》，不難發現在司馬遷的現實生活中，也搬演著同樣的劇

²⁵ 《史記 魯仲連鄒陽列傳》，頁999。

²⁶ 《史記 魯仲連鄒陽列傳》，頁999。

²⁷ 《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頁1205。

²⁸ 《史記 汲黯列傳》，頁1270。

碼：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²⁹

司馬遷的痛心，卻為他帶來宮刑的奇恥大辱。在醜惡現實的逼迫與無能為力的沉重感下，司馬遷在《史記》的寫作中，對於媚主求榮，蔽主視聽者特別有錐心之痛，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對於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感傷

「人情薄如紙」、「樹倒猢猻散」的場面總教人不勝唏噓，不幸司馬遷在李陵一案的過程當中，就親眼見證了人性中這醜惡的一面。「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³⁰而這些當初奉觴上壽的公卿到哪兒去了？一個個悶不吭聲不說，甚而為了自保，隨而媒孽李陵之短。不過數日，態度丕變，兩相對比，真是情何以堪？這也是正是為什麼司馬遷在《伍子胥列傳》中要推崇那位危難不棄，重情重義的江上漁父的原因了。江上漁父雖然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與伍子胥素昧平生。然在伍子胥倉皇落難之時，不僅義渡子胥免於追兵之患，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回報。比起世上人們趨炎附勢的聚合，江上漁父的情操不知

²⁹ 《文選 報任少卿書》，頁 1038。

³⁰ 《文選 報任少卿書》，頁 1039。

高尚多少？司馬遷在《史記》當中是忠實又感慨地把世人這一面揭示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看：在《孟嘗君列傳》中，自從孟嘗君遭齊王毀廢之後，諸客盡去；後經召而諸客才又復之。孟嘗君一時無法接受賓客無情現實地離去，曾忿忿不平地欲唾其面而後甘心：

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馮驩）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³¹

太史公也藉由馮驩之口，道出人心追名逐利的一面。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³²

為了求利，故人們趨炎附勢；一旦失勢，所求既不可得，便就毫不留情地掉頭離去。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廉頗也有同樣的遭遇：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

³¹ 《史記 孟嘗君列傳》，頁 948。

³² 《史記 孟嘗君列傳》，頁 948。

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³³

太史公雖然明白世態炎涼的道理，卻無法不為此感傷。在《平津侯主父列傳》的論贊中，他就明白地對人情冷暖的迴變表現出慨嘆之意：

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³⁴

這樣的處境豈非和李陵極為相似？從「皆譽之」到「爭言其惡」，其中不知有多少醜陋的態狀讓人寒心？再如《汲鄭列傳》中司馬遷也說到：

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³⁵

《史記會注考證》中瀧川龜太郎於此文下有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孟嘗事，與此相似。野客叢書對比論之。王鏊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

³³ 《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頁989。

³⁴ 《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頁1210。

³⁵ 《史記 汲鄭列傳》，頁1271。

朋友不救腐刑來。』」³⁶。不過我們卻認為這段慨嘆除了對於朋友之間真情誼的嚮往之外，應也是太史公目睹整個李陵案始末後，對於滿朝同僚為求自保而個個噤若寒蟬，甚而落井下石的可議之舉，其心中無法釋懷的沉痛的抒發吧！「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世態炎涼，怎能不讓人黯然神傷？這也無怪乎成為《史記》當中司馬遷相當關注的主題之一了。

四、「多愛不忍」——對筆下人物的愛惜與同情

早在《法言 君子篇》中，揚雄就已經提出了：「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³⁷的論點；李長之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中也曾說道：

試問又有誰像司馬遷那樣具有大量的同情，卻又有那樣有力的諷刺，以壓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著最造型底史詩性底筆鋒，出之以唱歎的抒情詩底旋律的呢？³⁸

司馬遷到底愛不愛奇並不在我們此節欲討論的範圍之內。本節擬由司馬遷能「對失敗者予以同情，從多方的角度發掘人物可愛可敬的特質」這點來談起。

身為史家，客觀公允是必備的條件，評論人物務求能以不偏不倚為要。然而

³⁶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民國79年，頁1252。

³⁷ 揚雄撰，清汪榮寶疏：《法言義疏》，臺北：世界書局，民國51年4月，頁747。

³⁸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1。

我們除了這項史家必備的基本要件之外，另外還看出了司馬遷個人浪漫性格³⁹所造就的獨特觀點，這樣的性格使他筆下常在無意間流露出深厚的同情。

我們先以夫差為例來做說明。太史公對於夫差亡國殞身的下場其實並沒有太多苛責，因為他不但照章全錄了《國語 吳語》當中夫差自殺前臨終的懺悔，還增添了夫差「蔽其面」、又自悔「不用子胥之言」等幾個小插曲，更讓《左傳》當中所述的夫差各式荒淫暴虐的行徑隱而不顯；在在都表現了司馬遷多少被夫差這個亡國之君的臨終悔悟所打動，因此下筆時除了依照客觀事實陳述吳國滅亡之因外，其餘甚少過度責，這是司馬遷「不忍」的一面；范蠡以其急流勇退的智慧，以及為富而仁的形象，獲得了太史公高度的評價，這是他愛惜其才，深服其人的另一面。

除了上述例子之外，餘例尚有甚多。對於韓信，司馬遷也惋惜地說：「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⁴⁰多麼充滿同情的語氣！再看蘇秦之例。太史公為蘇秦獨蒙惡聲平反，他說：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

³⁹ 李長之謂司馬遷具有「浪漫的自然主義」性格。「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司馬遷在性格上更占大量成分的乃是他的濃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樣的詩人。所以結果，假若用一個名詞以說明司馬遷時，我們應該稱他為浪漫的自然主義。」《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219。

⁴⁰ 《史記 淮陰侯列傳》，頁 1066。

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⁴¹

對於蘇秦過人之智，司馬遷也持肯定的態度，對於一般世俗的詆毀並不以為然，認為多半是被後人妄附的。這是司馬遷能從多方角度去發掘其人可敬可愛處，是太史公「愛才」的一面。我們還可以再看看《酷吏列傳》中的例子。雖然酷吏在司馬遷筆下的面貌是用法刻深，嚴峻暴虐；然其亦有可取者哉：

然此十人（酷吏）之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⁴²

對於這些酷吏「禁姦止邪」的稱職表現，司馬遷也不吝給予正面的評價，這也是他能獨具隻眼，看出酷吏的價值所在。

對各方面有傑出表現的人物，太史公總是不忘矜其能，惜其才。《貨殖列傳》為能從商致富者作傳，便是肯定做生意同樣需要過人的眼光與膽識，和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或軍事將領沒有什麼不同。周人白圭便是一個例子。太史公說他「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⁴³不僅如此，他為人還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⁴⁴，簡直和優秀將軍的帶兵一樣出色。所以太史公也藉白圭之口說出：「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⁴¹ 《史記 蘇秦列傳》，頁909。

⁴² 《史記 酷吏列傳》，頁1287。

⁴³ 《史記 貨殖列傳》，頁1338。

⁴⁴ 《史記 貨殖列傳》，頁1338。

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⁴⁵要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智、勇、仁、彊缺一不可，這不但可以看出太史公對白圭的推崇，也足見司馬遷對於在各領域有所擅場的人物的賞識。

至如 刺客列傳 裡所描繪的人物，個個重然諾，講義氣，為了知己甘於提刀赴死。也許在一般人的眼中，這些人捐棄生命的理由或許太微不足道：豫讓為智伯漆身吞炭，只為報智伯「國士遇之」之恩；聶政為報嚴仲子之厚遇而遂刺韓相俠累，又怕連累其姐而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雖然這些人物事蹟不曾為歷史留下至為關鍵的一環，但其中感激處，壯烈處，捨己處，正是足以讓太史公為之動容立傳的緣由。而游俠們「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⁴⁶，太史公對這些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快意游俠，同樣感佩欽敬不已。

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有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⁴⁷

雖然游俠行止有違當時法令，然而在太史公眼中，他們是非分明，廉絜退

⁴⁵ 《史記 貨殖列傳》，頁1338。

⁴⁶ 《史記 游俠列傳》，頁1301。

⁴⁷ 《史記 游俠列傳》，頁1302。

讓；不凌弱，不恃強，反而比一些巧取豪奪，魚肉鄉民的地方朋黨強梁可愛的多了。這些最足以說明太史公之取人用事不泥一格，不同的人物在太史公筆下千姿百態，各自有其可敬可佩之處。

最後還是不能不提及項羽和李廣。雖然他們在歷史的舞台上下場是失敗的，但司馬遷對他們的愛惜之情未嘗稍減。項羽「匹夫之勇」與「婦人之仁」的性格為其一生失敗的肇因，然而細讀之下劉邦「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⁴⁸；「吾翁即若（項羽）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柸？」⁴⁹等行徑舉措，比起項羽「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⁵⁰的婦人之仁，又何嘗高明？而項王豪氣干雲，意氣風發之態，也只有在司馬遷筆下才能淋漓酣暢地展現一代英雄飛揚跋扈的氣魄⁵¹；烏江自刎一幕，讀之令人悲咽流涕，心神俱傷，項羽的結局又何其慷慨悲壯。我們怎能說太史公對項羽沒有一絲愛惜與同情呢？

李將軍列傳 中的李廣更是受太史公愛惜的人物。司馬遷不僅在 李將軍列傳 裡力讚李廣之能，並且多重刻畫他帶兵的方式，以及他驍勇善戰的形象。

⁵²；同時對其一生無緣封侯，最後引刀自刎的下場感到惋惜悲嘆。⁵³對比 衛將軍

⁴⁸ 《史記 項羽本紀》，頁153。

⁴⁹ 《史記 項羽本紀》，頁155。

⁵⁰ 《史記 淮陰侯列傳》，頁1059。

⁵¹ 如「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等。見《史記 項羽本紀》。

⁵² 如「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等。見《史記 李將軍列傳》。

⁵³ 如「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

驃騎列傳 中的霍去病，「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⁵⁴司馬遷對李廣的益發不捨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長之說道：

司馬遷在他的書裡，對各種人物都深具同情，在同情之中而復很深入地論其短長，其中確有司馬談的影子在。⁵⁵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太史公其筆下人物，縱然沒有人是完美的，但不管是成功或失敗，富貴或貧賤，得勢或失意，在司馬遷「多愛不忍」的性格下，對各種人物無不帶著愛惜與同情。是以當伍子胥揮兵入郢，做出掘墓鞭屍之舉時，司馬遷並未加以苛責，反而在論贊中稱伍子胥為「烈丈夫」，這的確是對伍子胥其人格及他「倒行逆施」行為的根本了解與同情。所以對筆下人物充滿愛惜之情便成為司馬遷《史記》的重要個人特質之一。

五、對於君王性格陰暗面的揭露

相較於前代史籍，賢者恆美，不肖者恆惡；對於賢君仁人的描述彷彿如白璧無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論贊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見《史記 李將軍列傳》。

⁵⁴ 《史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1 2 0 0。

⁵⁵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3 7。

瑕般完美的作法，《史記》當中是不常見到的。司馬遷筆下極注意人物多樣性的呈現，上節也曾討論過。司馬遷不因人害事，以人廢言；不虛美，不隱惡。這是他為良史的客觀無私。即使貴為一國之君者，其為人行事也難逃太史公史家專業的檢驗。

對於《史記》當中揭露有關君王為求專擅政權所使用的手段，以及其性格陰暗晦深一面的描寫，我們不妨先從句踐談起。句踐二十二年來生聚教訓，忍辱負重，終有所成，其事充分得到太史公史筆的認同與肯定。然對其「免死狗烹」，「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的性格，以及誅殺功臣等冷漠無情之舉，更是令同樣身為人臣的太史公大表寒心。在《史記》當中，潛藏於句踐內心深處幽微陰暗的面貌，均一一為太史公所勾勒披露。

不僅如此，我們也可以在《史記》當中所描繪的漢朝歷位君王身上發現同樣的情形。先來看看漢高祖劉邦。高祖刻薄寡恩的陰暗性格從漢初三傑：蕭何、張良、韓信三人的遭遇便可見出端倪。蕭何受到高人指點，知道高祖怕他深得民心，先以「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來博取高祖的歡心，果然「高帝乃大喜」⁵⁶；復又「多買田地，賤賞貸以自汙」於是「上乃大說」⁵⁷。蕭何自我「污名化」的努力只為了能讓高祖對自己放下猜忌之心，以避開殺身滅族的災禍；韓信善於用兵，且掌兵符，高祖對他也是多所疑慮，還曾經「自稱漢使，即其？內，」然後「奪其符印，以麾召諸將，易置之」⁵⁸；其後韓信為呂后設計誘殺，高祖知情後「且喜且憐」⁵⁹，多麼傳神又簡潔地寫出高祖對韓信「除之而後快」的心情？太史公描述韓信的遭遇正充分體現了「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的

⁵⁶ 《史記 蕭相國世家》，頁 804。

⁵⁷ 《史記 蕭相國世家》，頁 805。

⁵⁸ 《史記 淮陰侯列傳》，頁 1062。

⁵⁹ 《史記 淮陰侯列傳》，頁 1066。

悲哀。至於張良，和范蠡一樣，因為深知急流勇退之道，選擇了「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乃學辟穀道引輕身」⁶⁰，果然在高祖一朝得以全身而退，享以壽終。其子不疑襲侯，卻在文帝五年即因「不敬」的罪名而國除。由此得見，雖君王昔日倚之為股肱良臣，然其下場亦不過如此，君臣間之互信互守可謂蕩然無存。

再看一向以寬厚仁愛著稱的文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居處甚驕，當時袁盎也曾力勸文帝：「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⁶¹，但文帝弗用。等到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之事牽連到淮南王時，文帝才決定把他遷到蜀地去，僅以輜車傳送。袁盎又諫，指出皇上既素驕淮南王，不曾稍禁；如今出事又「暴摧折之」，以淮南王性格之剛，一旦路上遭蒙霧露，則必死於道上無疑；而皇帝必須承受「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的惡聲。結果淮南王果病死於雍地，文帝才「輟食哭甚哀」⁶²。此外，早在孝惠、高后時期，吳王濞早有反相。他「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⁶³，又稱病不朝。文帝不但沒有處置，任由吳王日益驕大。當時身為太子家令的？錯曾「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但「文帝寬，不忍罰」因而導致「以此吳日益橫」⁶⁴的局面，最後演變成在景帝時爆發了「七國之亂」的嚴重衝突。

於此我們很難不聯想到「鄭伯克段於鄆」的歷史故事。共叔段與鄭莊公為親手足，然因莊公失教，放任其弟坐大，等到其反狀已成，才一舉殲滅之，其事早為史家所難；文帝與吳王為堂兄弟，同樣犯了縱容之過，而七國之亂的結果是全面削減了地方諸侯的勢力，讓漢朝逐步走向中央集權的道路。此事是否由文帝蓄

⁶⁰ 《史記 留侯世家》，頁 817。

⁶¹ 《史記 袁盎？錯列傳》，頁 1115。

⁶² 《史記 袁盎？錯列傳》，頁 1115。

⁶³ 《史記 吳王濞列傳》，頁 1152。

⁶⁴ 《史記 吳王濞列傳》，頁 1152。

意主導我們不得而知，然光就事件發展的結果推究，不免讓我們猜測：文帝當時的「不忍」，其背後的用意也許是很深的。

這樣深沉複雜的君王性格景帝亦有之。景帝為太子時十分信任為太子家令的？錯，素號有「智囊」之稱。等到景帝即位後，遷錯為御史大夫，同時採用了？錯對諸侯削地收郡的策略。此時爆發了以吳王濞為首，以誅錯為名的七國之亂。景帝為求平息眾怒，竟因此設計「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⁶⁵，？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皇帝出賣，枉送性命；而叛變的諸侯當然也沒有因皇帝誅殺？錯而罷兵。當時身為校尉的鄧公以言吳楚軍事為由進謁皇上，直言諫曰：

夫？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⁶⁶

在鄧公不諱言地直指其過的情形下，景帝才被迫承認：「公言善，吾亦恨之。」⁶⁷削地政策既然正確，於國家有萬世之利，卻因皇帝一時的怯懦而設計誣殺？錯。為人君者行詐偽之道，以臣子性命作為換取一時苟安的犧牲品，其行實在令人不敢認同。

尤有甚者。周亞夫為弭平七國之亂的功臣，後為景帝遷升為丞相。然因廢栗太子事及策封皇后兄王信、匈奴降王為侯等議題上兩人意見相左，是以景帝日疏

⁶⁵ 《史記 吳王濞列傳》，頁 1 1 5 5。

⁶⁶ 《史記 袁盎？錯列傳》，頁 1 1 1 9。

⁶⁷ 《史記 袁盎？錯列傳》，頁 1 1 1 9。

之，亞夫遂以病免相。然景帝不僅召而折辱之，⁶⁸沒多久，又指控亞夫有謀反之實而使吏捕之⁶⁹。最後周亞夫不食五日，嘔血而死。死後，景帝馬上就策封王信為蓋侯，違反了高祖時定下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之約。凡此，我們不只看到了景帝陰險的一面，更看出他褊狹自私的性格。

至於武帝，雖然表面上其手段不若景帝般凶殘狠辣，但是他私下縱容酷吏陰狠為虐，其危害之大，影響之廣，手段之慘酷，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官員的迫害，我們以大農令顏異為例。當時御史大夫張湯，減宣、杜周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人正是「隆貴用事」之時。顏異對於武帝、張湯所造之「白鹿皮幣」頗不以為然，武帝因之不說；再加上張湯與之有隙。於是針對顏異友人在寬慰他「初令下，有不便者」時，異做出「反脣」的舉動，便因此指控顏異有「腹誹」之罪而論死。消息傳出後，從此「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⁷⁰。而興利之臣者如桑弘羊，他「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對於一般升斗小民的民生更是造成莫大的威脅，以致乃有「烹弘羊，天乃雨」⁷¹之語，民怨之沸騰由此可見。武帝利用酷吏作為其工具爪牙，以對其臣民進行嚴厲的控管，不正顯示出其人背後陰暗深沉的一面？太史公對君王幽微心理的刻畫與呈顯，是極其細膩而深刻的。

六、結語

⁶⁸ 《史記 絳侯周勃世家》：「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頁 830。

⁶⁹ 《史記 絳侯周勃世家》：「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頁 830 - 831。

⁷⁰ 《史記 平準書》，頁 567 - 568。

⁷¹ 《史記 平準書》，頁 570。

接續《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史著以降的敘事技巧，同時也加強了前代史籍對人物描摹表現的力度，運筆臻於成熟，《史記》在各方面的進步可謂斐然有成。面對如此浩繁的史料，若不是司馬遷用盡一生的心力下手彙整，並且憑藉著他的史才與史識，逐步建構出一個包羅萬象又迷人多彩的歷史空間，恐怕我們後人只得耗費許多精力，揀拾綴連斷簡殘編，才能彷彿想見其人於一二了。

吳越爭霸的歷史不過短短數十年時間，然而司馬遷卻能在有限的篇幅裡，刻畫出眾多人物的風采，能讓這些人物的鮮明形象深植在後代讀者的心中，可謂得到空前的藝術成就。

而我們比對他大量取材的《左傳》、《國語》等史料，從司馬遷對這些人物圖象的構築與安排上，獲致了影響司馬遷敘事作史時的心理依據。司馬遷作《史記》欲「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有所寄託的心情雖化於筆下於無形，然吾人讀《史記》，豈可疏略而罔視之哉？當我們展卷於案前燈下，細品歷史人物一生悲喜之餘，聆聽作家文字底下的聲音何嘗不是另一項重要的課題？是以我們不憚辭費，亟欲闡明司馬遷的創作意識，其用意在此。